

開國五十年莊嚴燦爛第一章

黎東方

武昌起義的完整史實

(一)

武昌起義前五天，辛亥年八月十四日，黃興從香港發出一封信，寄給在舊金山的馮自由。信裏說，居正從上海託人帶了信來，武昌的同志已有了兩千多，分佈在清軍各個部隊，組織得很嚴密，情緒極熱烈，急於發動。胡瑛雖已入獄，他所領導的也有一千多人，其中頗有加入居正的團體的，很能合作。「今既有如此之實力，則以武昌為中樞，湘粵為後勁，寧皖陝蜀亦同時響應以牽制之，大事不難一舉而定也。」大略有二十萬左右，即足為完全之預備。至少四五萬，亦可發起鄂事。「故特由尊處轉電中山，想我兄接閱，必為竭力援助！」

黃興在寫信的時候，絕不知道武昌的同志早已在八月初三日舉行了一次會議，決定在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半夜之時動手。會議的地點是騰脂巷十一號，主席是共進會會員孫武，出席的是各部隊革命同志的代表，包括第八鎮（師）工程營的熊秉坤，憲兵隊的代表，包括第八鎮（師）的蔡濟民，步兵第三十標的彭楚藩，炮兵第八標（團）的蔡濟民，步兵第三十標的楊宏勝，第二十一混成協（旅）步兵第四十一標的劉堯激等等，共三十二人。

了與漢排滿而跑到清軍第八鎮工程營當小兵的書生胡瑛與張難先。他們不但鼓動了營中的許多士兵，而且也聯絡得很多文武學堂的學生，包括武備學堂的呂大森與「文普通學堂」的宋教仁。科學研究所在光緒三十年五月成立，以呂大森為所長，胡瑛為總幹事，宋教仁為文書。六月間，黃興來到武昌，和他們約好在十月初十，武昌與長沙同時起義；他們也就積極準備起來。到了九月間，秘密被人洩漏，科學研究所被搜，但是清吏不曾捕到一人，只是開除了宋教仁及其他一個學生的學籍了案。

同志之一，劉靜庵，利用基督教聖公會附設的日知會，繼續鼓吹革命。日知會本來只是一個閱報室，被劉靜庵已改組成革命團體，於光緒三十二年正月成立，受同盟會湖北分會會長余誠的指導，辦了東游預備科、明新公學、及群治社等等機關。十月間，孫先生派了在東京加盟的胡瑛，與朱子龍、梁鍾漢回到湖北，策應劉道一在醴陵瀏陽所發動的義軍，他們來聯絡日知會。二十三、四兩日，胡瑛、朱子龍、梁鍾漢、與劉靜庵、張難先、李亞東及其他同志三人，一齊被張之洞逮捕下獄。

日知會的同志之一，任重遠，與獄中的李亞東密商，集合了軍中的同志黃申鄴等四百餘人，於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開軍隊同盟會成立大會於武昌洪山羅公祠。李亞東而且在獄中主辦了一個「通俗白話報」。不久，清吏加以取締，會務無形停頓。

熊秉坤也是共進會的會員。彭楚藩屬於「文學社」，為了謀求兩個團體的合作，特地也加入了共進會。蔡濟民屬於共進會，為了同樣原因，也加入了文學社。楊宏勝與劉堯激二人，均只是文學社的社員，不會參加共進會。

共進會的力量較大，歷史較久，創始於東京，奉同盟會的總理孫先生為該會總理，以同盟會的「中部總機關」的湖北主持人居正為精神上的領導者，而實際上的主持人是劉公（姓劉名公），原名劉仲文，籍隸湖北襄陽。劉公的最大助手，是孫武。作為這個會的最初發起人，同時也是奔走最力的熱心份子的，是湖南瀏陽人焦達峯。焦是同盟會的調查部長，負有聯絡會黨之責。因此，共進會吸收會員的對象，也就是會黨英雄。特地為他們創立一個「山頭」，稱為「中華山」。共進會之所以不自稱為同盟會的支部，一則是為了避免清吏注意，二則是為了自成團體，行動自如。

各學社的前身是振武學社；振武學社的前身是群治學社；群治學社的前身是軍隊同盟會；軍隊同盟會的前身是日知會；日知會的前身是科學研究所。科學研究所的最初發起人，是兩位自動從戎，為

十一月二十日，軍隊同盟會的黃申鄴等在小東門外三里左右的金臺茶館開會，成立群治學社，黃被選為社長。學社辦了漢口商務報，宛思演為經理，劉堯激為襄理，詹大悲為總主筆，何海鳴等為撰述，使得武漢三鎮的革命空氣，日益濃厚。宣統二年三月，學社準備起義，未成，商務報被封，黃申鄴於憲兵來捕之時逃逸，去了上海。

這一年七月間，群治學社的同志楊王鵬等，在清軍第四十一標第一營左隊（第二連）隊部，成立振武學社，楊王鵬當選為社長。十月，光緒皇帝病故，楊王鵬準備起義，被協統黎元洪撤職，振武學社的社務因此停頓。

宣統三年正月元旦，振武學社的同志蔣翊武、劉堯激、詹大悲，等人在黃鶴樓的風度樓開會，改組，成立文學社，以蔣翊武為社長，詹大悲為文書部長，劉堯激為評議部長。成立以後，由於領導得人，社務突飛猛進。

(二)

同盟會在香港的統籌部，於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舉行廣州起義，事前，統籌部派了湖南同志譚人鳳來湖南、湖北佈置將來響應與迎接北伐軍的工作。譚人鳳到了武昌，與共進會頗有聯絡，對文學社却不十分重視。共進會居正、孫武等人，積極準備了一頓，不幸廣州起義失敗，一切又成白費。

孫武等人甚不甘心，決定了雖則廣州方面已經失敗，仍在武昌發難。

遠在宣統二年的夏天，居正與宋教仁、趙聲、譚人鳳等人在日本朝夕會談，便已感覺到，與其在邊遠的廣東等地開始武裝行動，倒不如先在長江流域着手的好。到了宣統三年春天，廣州起義失敗，宋教仁就毅然決然邀約陳其美、潘祖彝、呂志伊等。於閏六月成立了一個「同盟會中部總機關」，以宋、陳、潘、譚、及楊譚笙為總幹事，以居正為湖北主持人，曾傑、焦達峯為湖南主持人，南京、安徽等地，也各派一人主持。他們在宣言中聲明，「奉東京本會為主體，認南部分會（統籌部）為友邦，而以中部別之。」

「中部總機關」正式成立之時，居正向在武昌、漢口，忙於促成共進會及文學社的聯合。這一項工作，到了七月初才辦妥。雙方的領袖舉行聯合會公推文學社的蔣翊武為「革命軍臨時總司令」，共進會的孫武為參謀長兼政治籌備處主持人，其他各人分任參謀、文書、內政、交通、財政、傳達命令。軍中各單位同志分別選出代表，預定事成以後即各由其代表任指揮官。一般的同志，納入秘密的軍隊化的組織，以二十人為一支隊，五支隊為一隊，排設排長，隊設隊長，臨時總司令部設在小朝街八十五號，政治籌備處設在漢口法租界長清里九十八號，炸彈製造處設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十四號，「分機關部」設在武昌騰脂巷十一號。

作戰的主要目標，是湖廣總督瑞澂的衙門。其次，該是第八鎮（師）統制（師長）張彪的司令部。再其次，是第二十一混成協（旅）統領（旅長）黎元洪的司令部。

瑞澂的直屬武力，是：衛隊（機關槍隊）一隊，憲兵隊一隊，武裝消防隊一隊，巡防營五營（內四營分駐外縣），水師五營（皆駐外縣），警察（人數不詳）。

張彪的武力，是：步兵第十五協，第二十九標，第一營（武昌中和門外），第二營（武昌中和門外），第三營（開往襄陽即陽）。第三十標，第一營（武昌中和門外），第二營（漢口），第三營（武昌中和門內）。步兵第十六協，第三十二標，第一營（開往四川），第二營（準備開往四川），第三營（開往宜昌）。馬隊第八標，第一營（武昌南湖），第二營（開往襄陽），第三營（武昌南湖）。礮隊第八標（武昌南湖）。工程第八營（武昌黃士坡）。輜重第八營（武昌平湖門外）。憲兵第八營（武昌楚望臺附近）。

黎元洪的武力，是：步兵第四十一標，第一營（開往宜昌），第二營（開往岳州），第三營（武昌寶陽門內）。步兵第四十二標，第一營（漢口居仁門內），第二營（京漢鐵路沿線），第三營（漢陽兵工廠）。馬隊第二十一營（武昌南湖）。礮隊第二十一營（武昌勝門外塘角）。工程第二十一隊（武昌勝門外塘角）。輜重第二十一隊（武昌勝門外塘角）。

發難的日期暫不預定。準備的工作，限於七月二十日以前完成。

七月二十四日，一切的佈置大致就緒，居正去上海，向「中部總機關」報告，同時託陳其美買手槍，寫信託黃興向馮自由請款。

共進會於譚人鳳來鄂之時，經由居正之手，收到同盟會統籌部的協助款項八百元。其後，居正與焦達峯設法盜取蕪春洗馬坡達城廟的金菩薩，功敗垂成。有一位同志鄒永成，知道他的伯母有錢，用麻醉藥放在酒裏，但是伯母飲了五杯，只是頭昏而已。最後，大家還是勸了劉公（仲文）獻出家裏給他捐官的五千元，才把革命機關一一維持，手槍炸彈分別購製。

黃興一面向馮自由開口二十萬，以便各地同時大舉，否則至少五萬，單在武漢一地起義；一面勸居正轉告武漢同志，稍候，候到陰曆九月初，十一省同時大舉。武漢的同志不願意等待，理由是：①因清廷宣佈鐵路國有政策而引起的保路風潮，正在蔓延，由川而湘而鄂，已經把武漢人民的怒火點起，②含有同志頗多的第三十一標（團）與第三十二標，已被鐵路大臣端方帶往四川，其他部隊難免不在短期間又被帶走；革命軍臨時總司令蔣翊武是此四十一標第二營的士兵，已隨軍移到岳州。

八月初三，大家在騰脂巷分機關部開會，議決：在八月十五日中午秋節的半夜十二點鐘起事。同時規定了作戰計劃。

在這些部隊之中，步兵第三十標之中的革命勢力較弱，因為其中的滿旗人與漢旗人不少；工程第八營之中的革命勢力最強，由於接受革命的宣傳最早。而且，在工程營所在地的黃士坡，同志們設了一個同興酒樓，經理是鄧玉麟。

八月初三所決定的作戰計劃，是：午夜由塘角輜重營的同志放火為號，黃士坡的工程第八營進城佔領楚望臺的軍械庫，南湖的礮隊進城攻總督衙門，由三十二標協助，南湖的馬隊在城門警戒，三十一標與四十一標的留守部隊佔領蛇山，在漢陽的四十二標第三營佔領龜山，在漢口的四十二標第一營，會同第二營，向北發展，佔領鄂豫交界的武勝關。

因此，作為上述各個部隊的「代表」的，責任十分重大。而熊秉坤雖則位僅排長，却是工程第八營的總代表。

(三)

當天下午，發生了一件意外，南湖礮隊的同志瞿殿臣、孟發丞、錢芝生、張若舟等人，替一個被迫請了長假的徐青夫同志踐行，慷慨悲歌，聲達戶外。排長來干涉，於是發生衝突；隊長（連長）祖護排長，要將瞿等四人鞭打，瞿殿臣搶了礮，想放，找不到礮彈，於是四人便帶了槍走。連長派兵追，孟發臣中了一彈，飛奔到騰脂巷十一號報告孫武，孫武想立即提

前在當天起義，劉堯激不贊成。但是，不將起義的日期提前，便須將牠移後，大家討論的結果，把牠改定在八月十八日（比原定的日期晚三天）。

誰料到，好事多磨，在八月十七日又出了事。這一天中午時候，孫武在漢口寶善里趕造炸彈（他是一個專家），埋頭工作。旁邊有一位糊塗同志，大抽其紙煙，把火藥搞得燒了起來，濃煙四起，瀰漫室外，雖則不會發出轟然巨響，却已警動了四鄰，向俄國巡捕報了火警。孫武呢，已被火藥燒得焦頭爛額，慌忙走到一家日本人的私家醫院去療治。不久，俄國巡捕來到，搜去了不少的火藥、炸彈、手槍、旗子、佈告、簿子，也抓走了呆在這裏的劉同（劉公的弟弟）。一會兒，劉公的小老婆李貞清，和一位劉協卿，回來搬衣裳與零用的東西（因為劉公和小老婆一向住在這個機關），也統統被俄國巡捕帶走。

消息傳了開來，同志們十分焦急。簿子，大家以為是名冊。（究竟是不是，待考。）於是，人人自危。而且，李貞清與劉協卿被引渡到清方的江廈道衙門，怕挨打，把他們二人所知道的秘密，一五一十地直招不誤。

清吏如臨大敵，滿街佈置了巡邏兵。共進會與文學社的領導份子，於八月十八日早晨在小朝街八十五號舉行會議，才聽到孫武燒傷的事，大驚失色。幸虧蔣翊武剛好爲了當夜要起義，已經從岳州趕回武昌，主持會議。大家談到下午五點，一切談出頭緒，便

樹屏等人審訊，被判斬首，在八月十九日黎明就義。和他一同就義的，是楊宏勝。楊宏勝在右旗後營門他家裏被捕。他原爲三十標的正目（班長），爲了革命而請長假，開了一個小店，負責傳遞炸彈給各部隊的同志。

（四）

彭劉楊三烈士，是武昌起義之中最先犧牲的同志。今天武昌有一個三烈士亭，便是紀念他們的。

楊宏勝於被捕以前，遷到了黃土坡送炸彈與兩排步槍子彈給工程第八營熊秉坤，守營門的剛好是一位同志。步槍子彈平時不必送，此時因當局已經收繳了子彈（除了所謂可靠的官長以外）。

熊秉坤覺得僅有此兩排子彈，不敷應用，又託了本營別的同志向官長偷來五排兩盒。然後，他把這些子彈分配給營內若干人，作爲起義之用。

八月十八日，熊秉坤等到半夜，不見塘角火起，又聽不到中和門外南湖礮隊的礮聲。等到夜半以後，仍無消息。

八月十九日，彭劉楊的噩耗傳來，空氣更加緊張。同時，也有同志傳來口訊，說「改於今夜起義」。但有人說是仍爲夜半，有人說是改在下午七點第一次點名之時。

由蔣翊武以革命軍臨時總司令的名義頒發「起義命令」。

命令的內容在大體上按照八月初三的作戰計劃：塘角礮重營放火，黃土坡工程營攻佔楚望台軍械庫，南湖礮隊第八標進城攻總督衙門，四十二標進佔武勝關。所不同的，是：放火以外，加上放礮，由南湖礮隊負責攻佔楚望台的任務，加派二十九標第一營後隊（第四連）與礮隊第八標第一營協助。攻打總督衙門的任務，改由二十九標第二營爲主，三十二標第二營協助，礮隊第八標第一營在楚望台架礮射擊，此外，關於何一部隊負責各城門的防守，布政使衙門與官錢局、善後局、電報局等地的攻擊與佔領，江上兵船的制壓，也都有具體的指定。

可惜，一方面由於當局宣佈戒嚴，軍警機關與學校一概禁止出入，這命令極難傳遞，負責放火與放礮的單位，到時候並未照辦；一方面，在當天晚上軍警便來到了小朝街八十五號，把蔣翊武、劉堯激、彭楚藩，和三個其他同志，與住在這房子裏的張廷輔的眷屬、鄰居警察高等學堂的學生二十幾名，一齊抓去。起義的事，並未如期實現。

蔣翊武運氣好，辮子還不會剪，穿的衣服又是長袍，棗紅馬褂，土裏土氣，到了警察局，他先問警察，「抓我爲什麼？」警察以爲只有剪了辮子或身穿西服的人才革命黨，便把他放了。

彭楚藩與劉堯激被解到總督衙門，由武昌知府陳

事實上，蔣翊武在當天早上，託了胡培才告訴大家「一切照原令辦理，夜半起義」。其後，見到街上貼有官府懸賞捉拿他的佈告，這才忽忽忙忙地去了天門縣，找劉英。

劉公與張振武均未能和他會面，也未能彼此會面。他們兩人却分別當仁不讓，於群龍無首之際，傳下命令「改在十九日起義，但時間提前在下午七點。」真是英雄所見略同。他們之所以把時間提前，可能是爲了實行孫子兵法上的「出其不意」。

然而到了下午七點，既無塘角之火，亦無中和門外之礮，各處毫無動靜。

熊秉坤在黃土坡工程營，約好大家靜等。等到燈號吹了，燈也熄了，大家仍舊在等，希望等到半夜之時，會看到塘角火起，聽到中和門外礮響。

後隊（第四連）的同志特別興奮，一邊在等，一邊在切切私語，被值日的排長陶啓勝聽到，帶了護兵來稽查。他查出金兆龍與程正瀛二人抱槍而臥，吩咐護兵將二人綁了，護兵却不敢上前。他自己動手，抓住金兆龍手腕。程正瀛來不及考慮，立刻就用槍柄對準陶啓勝腦袋一打，陶啓勝狼狽奔逃，程正瀛追着放他一槍，剛好打中他的胸膛。

這一槍，成了武昌起義的信號。

熊秉坤聽到槍聲，跑來，對着那仍在狂奔的陶啓勝，又是一槍，却未打中。